

點石齋畫報中的 上海平民文化

● 葉曉青

人們往往厭煩日常生活的平淡而渴望戲劇性的故事，歷史偉人的轟轟烈烈事迹因此永遠有其魅力。然而一些歐洲史歷史學家卻從本世紀60年代起越來越把注意力投到默默無聞而又佔人口比例大多數的普通人身上，開始了平民文化的研究。1985年出版了由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和Evelyn S. Rawski合編的論文集《中國明清時期的平民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這是第一本開宗明義以中國平民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專著。上海在近代史中是個研究中西文化接觸的理想對象，西方文化在最大層面上影響了普通人——相對當時中國其他城市而言。因此本文選擇十九世紀末期上海，選擇當時上海最有影響的大眾新聞傳播媒介之一——《點石齋畫報》（以下簡稱畫報）^①，作為了解當時平民文化的鏡子。

「五方雜處」——上海的人口結構

儘管上海縣城在十九世紀前已頗具規模，如今人們所說的上海，即租界，卻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從上海最荒僻的地區發展起來的^②。1853年前，租界中的中國人口僅五百，外國常住人口三百；小刀會後大批中國人從城鄉逃入租界，第二年租界中中國人口便增至二萬^③。十八世紀60年代太平軍進攻江浙地區，更多的中國人避入公共租界。1865年在公共租界的中國人口已達90,587人，外國人口2,297人。事變過後，許多人返回故鄉，1870年公共租界的中國人口一度降至75,047人，但到1876年，人口又回升到95,662人，並逐年上升。到1890年時已達168,122人。1895年時公共租界上的中國人口為240,995人，外國人口為4,684人，1900年時分別為345,276人和6,774人。在中國人口中，主要來自江蘇、浙江、廣東和安徽。外國人口包括二十多個不同國籍，多為英國、日本、美國、

葡萄牙人等④。法租界人口變化的情形也相似，1865年法公董局第一次戶口調查時，華人有55,465人，外僑460人，這時的華人大多是避戰亂而來。1879年第二次調查時，中外居民合計也只有33,660人，華人為33,353人；1890年華人增至40,722人，西人444人；1895年華人51,758人，西人430人；1900年華人91,646人，西人622人⑤。統計數字並不顯示移民種類及原因。我們可以從畫報中的一些例子，對移民流入上海的原因進行初步分析。

一 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難民

畫報中有三例：一是某江西人因當地水災來滬，後經營販運瓷器生意，若干年後獲利頗豐（忠四十八）。另兩例都是蘇北來的災民。1890年一例是祖孫二人在街頭行乞，自稱遭水災後來上海（未九十一）；1897年一例講的是蘇北人作些小生意度日，後路遇失散多年的女兒（亨五十六）。

二 尋找機會發展者

這部分人中，有最具野心者，也有懷着最卑微的願望來上海、安於以自己體力換得基本溫飽的勞動階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上海乃至中國有影響的實業家，常出身貧寒，他們往往幼年或少年時來上海，從底層掙扎起，如榮宗敬弟兄、葉澄衷、曾鎬、祝大椿、朱葆三、徐潤等都是。

從《點石齋畫報》中可見到不同類型的商人。有些商人已有相當基礎，到上海尋求更大發展。如廣東富商（辛六十八）；做土地買賣的廈門商人（辛八十五）；福建商人，往返於台灣、上海，販運糖及棉花；這些往往都是巨額交易（忠十六）；在租界大馬路開珠寶店的南京商人（射四十六）。另有一些是小本經營者，如浙江台州小販（貞四十六）；山西米販子（行八十八）；開襪店的安徽人（午四十九）；販鷄的福建人（利四十九）；青浦小販（行三十二）；開五人裁縫鋪的崇明人（利十六）；上海街頭甚至出現賣牛肉的穆斯林小販（石八十七）。此外，還有一些不一定因遭災，只是為租界就業機會所吸引的附近鄉村的農民，尤其婦女。按官方記錄，上海女工的人數當時遠超過男工，如1899年租界有工人34,500人，其中20,000人為女工，7,500人為男工，7,000人為童工⑥。僅在畫報中提到的在繅絲廠或紡織廠工作的女工就有九例之多。有相當數量的移民是被立即發財的夢想驅使，鋌而走險來到上海。如1886年畫報中有一案子，九個從徐州、山東來的貧民，原以販運水果為生，抵滬後即認為此時不發財更待何時，便設法弄槍搶劫有利銀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結果全部落網（辛八十四）。其他形形色色的不正當生意人和三教九流也紛紛湧入。一些鄉下老婦到上海來開台基——為不相識的男女拉皮條或提供場所（酉六十九）；一些巫婆、道士、冒牌僧尼也紛紛來滬。畫報中的例子都是揭露他們如何以邪術騙錢（戊二十三；辰二十一；禮六十三）。

三 為逃避當地懲罰而逃入租界的罪犯

在人口流動迅速，來源複雜的城市，這種人很容易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如畫報中說的「滬北一隅，五方雜處，匪類其潛匿也」（寅一）。還有一例為：「蘇人程老七，席先人餘蔭，富有多金，酷嗜烟霞癖，且喜與牧豬奴為伍，以致被官訪緝。不能安居，不得已携妾某氏逃至申江，賃居新馬路昌壽里。」（貞七十九）上海不僅是中國罪犯的逃亡處，也是外國罪犯的避風港。這就是為何當時有人將上海稱為「罪惡通逃薮」的原因。如1889年畫報中有一消息講三個失業的水手，其中一個美國人、兩個英國人在租界鬧事，被巡捕抓走（巳五十三）；1886年，兩個美國人在虹口以槍相互射擊，被巡捕押至美國領事署（辛七十二下）；還有一次某輪船二副招粵妓上船，酒醉後將該妓刺成重傷（戊九十四）。

四 並非罪犯，但為當地道德所不容的人，也往往逃到風氣鬆馳的上海，其中多為男女私情

如姚公鶴所說「一二不理於輿論之人，見世界中尚有上海一隅之足以逃避吾眾棄之身也，則群習而安之。……每見一傷風敗俗之事，一般輿論則必曰此幸在上海耳，若在內地，即幸逃法網，亦不免為社會所不齒。」①如浦東（上海近郊）一寡婦與情人逃來上海同居，後來被兒子及鄉人發現後押回家（辛十五）。川沙（上海鄰近縣）某婦偕其情人私奔來滬，後也被鄉人押回（壬六十四下）。這些都是不成功的逃跑者，可以推測絕大多數逃亡者都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五 被拐騙來滬者

在上海人口中，尤其從事不正當職業者，如妓女，被拐騙者不在少數。如一消息說某廣東婦女家中養了五、六個拐買來的孩子，準備幾年後將女孩賣給妓院，男孩賣作苦力（辛五十七）。上海某妓幼年時從蘇北家鄉被人拐來上海，賣入妓院（亨五十六）。

六 其他因素，如戰局影響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在台灣的一些福建人挾資逃離來滬。畫報中有兩例：一為由台灣遷來上海的福建商人在上海仍作些小生意，後巧遇失散的兒子，原來父子不約而同地逃來上海（文二十四）。另一例是一些人從台灣到上海途中遇險，人雖被救起，但所携財物盡失（御四十）。

畫報中提到的外國人，一般不提及來滬前身分，有時連國籍與職業也不註明，僅提「西人某」。根據畫報中的例子，在滬外國人大致可分成：各國外交官及家屬（利三十九；戊五十五等）；傳教士（利三十九；乙四十二；巳二；酉十二）；醫生和律師（亥七十四；利三十



上海人口五方雜處，西方來上海的人中，三教九流都有。西醫治病，自然使中國人大開眼界。

九)；洋行職員(己一；甲八十一下；丙八)；士兵，如法國兵(行二十四)、德國兵(乙四十八)、英國兵(壬十八)、日本兵(乙五)；水手(己五十三；戊九十六下；戊九十四)；警察，包括印度錫克警察(酉八；利六十；戎四十九；絲六十九)；流氓，騙子。如一美國人在四馬路租房展覽所謂有頭無身之人，引來許多中國人購票觀看(丙七十七下)。

既然上海由各地移民組成，「五方雜處」成了當時最常見的形容上海的字眼之一，如「洋涇浜一隅，五方雜處，服色隨時更易」⑧；「滬上為通商總集，五方雜處」⑨、「五方雜處，音韻易淆」⑩等等。「五方雜處」不僅僅體現在服式、語言上，此後上海的風氣、特徵，乃至接受西方文化的方式、程度，無不與此種人口構成有關。

西方物質文明與上海人

租界的移民都是為了尋求新的機會，他們顯然不同於以捍衛傳統為己任的士大夫，也因此較少排外意識。城內某士大夫以三十年不踏進租界為豪⑪，則是另一面的例子。此外上海地區本地居民生性平和、友好，容易接納外來者，使得初到上海的外國人很驚訝，他們中甚至有人比較了廣東人與上海人性格上的不同，而斷言他們是不同種族⑫。由這樣的人口構成的上海市民，對外來文化自然持較寬容的態度。此種情況在日常瑣事中也反映出來。如南北方言中對外國人都有侮辱性稱呼——

「番鬼」、「洋鬼子」之類；惟上海人用「外國人」這個中性稱呼。此外，稱西人為「夷」是中國傳統。十九世紀60年代上海曾稱租界為「夷場」，改稱為「洋場」的確切時間，現還不能肯定，但在1876年葛元煦的書中已稱洋場。畫報中也已全改為「十里洋場」或「洋場」了（全部畫報中僅一次使用「夷場」，那是在激烈譴責租界當局把中國犯人當築路苦工的消息中——癸八）。

單純而無道德憂慮是上海市民的特點。在租界發展過程中，雖也偶因無知而產生恐懼，如對待自來水、電等，但好奇心又使他們樂於一試新事物，好奇心與講究實際的特點幫助他們接受西方物質文明。上海建自來水的動議，始於1870年。1883年租界開始使用自來水。當初遭到中國居民的反對，原因有三：一是職業挑水夫反對，據說租界當時至少有3000挑水夫^③。二是對世代代飲用黃浦江水的上海人來說，自來水價格偏高；第三個原因最重要，居民懷疑自來水有毒，當時有謠言說水塔中有人淹死，水有毒。後來自來水公司免費送水給若干茶館，市民們見自來水又乾淨又好喝，很快就開始接受。1886年，英租界華人用戶增加，並有人要求在家中安裝水管。1889年租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中國居民使用自來水。在80年代的《點石齋畫報》的畫面上，自來水龍頭已成爲上海街頭一種景象（絲六十六）。

燈光照明也是上海城市發展中一重要條件。1865年上海出現煤氣街燈，由於煤氣管埋於地下，中國人又稱之爲「地火」。1883年起電燈開始逐漸代替煤氣燈^④。在畫報中到處可見這類六角形玻璃燈罩的煤氣燈

小腳女人和拖着長辮子的男人光顧使用刀叉吃飯的西餐館易妻作樂，使上流社會中的風流韻事打上了時代烙印。



及圓形燈罩的電燈（甲十五；甲三十七；丙十九；丙八十二；辛十六；庚三十六等）。當時人曾將煤氣燈比作天上繁星，而電燈因其亮及形狀而被比作明月。中國的戲園、茶樓、書場、烟館、飯店、妓院中也很快採用煤氣燈及電燈。煤氣與電最初使用時也引起上海市民的恐懼，認為「地火」造成「以鐵管通火之處，其地面必薰灼難堪，此後馬路上除躡厚底者尚可抵抗外，凡赤足小工輩，徒躍奔走，熱毒攻心，必久而致命」^⑤。1894年畫報中報道了一則觸電事故：一個管理百老匯路一帶路燈的電工，在修理路燈時觸電身亡（樂四十）。這則消息至少透露兩點：一是電燈（路燈）普遍，已有專人分段管理；二儘管此人觸電身亡，但未引起社會上的謠言或不安定，比較當年上海道台出面抗議，社會風氣已非同日可語。

按照Fernand Braudel的理論，飲食習慣的改變在文明發展中有極大意義，所謂「告訴我你吃甚麼，我便知道你是誰」^⑥。十九世紀末的上海市民並沒有改變原來飲食習慣，但不少人開始嚐試並喜愛西式菜：「中國番菜館，始於一品香，開設四馬路中，當時人鮮過問，近數年間，華人頗有樂嗜西味，故踵開海天春、一家春。……諸館均分間設坐，陳列雅潔，禮拜六禮拜日座客常滿，定價每人一餐一元，坐茶七角，小食五角，外加烟酒堂彩，中外名酒皆備，儘有招妓侑酒。」^⑦從畫報中可以看見留着辮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腳的女人用刀叉吃飯。

上海人還很熱衷於觀看各種西人發起的體育運動，其中賽馬是頭等大事。有個在上海的英國人曾說，「英國人有兩樣事萬不可缺少——國



西方賽馬很快為中國人所接受和喜愛，所以上海每逢此盛事，「環而觀者為堵牆」。

王和賽馬」。⑩因此上海開埠不久，便有賽馬。1872年4月30日《申報》創刊號有賽馬消息，畫報第二期就有介紹賽馬的圖：「西人於春秋佳日例行賽馬三天，設重金為孤注，捷足者奪標焉。……」（甲十五）還有一幅說：「賽馬為上海租界盛舉，三日停辦公事，午後逐隊往觀看，寶馬香車，絡繹不絕。」（戊七十三）有時西方的戲劇歌舞也會吸引中國觀眾（石七十；午二），但上海人最入迷的是馬戲。據畫報記錄，1880、1886、1889年間，同一馬戲團三次訪問上海，人們奔走相告，招友呼朋前往觀看（庚四十二）。更令人驚訝的是1890年畫報中有一則關於「飛龍島自行車」的遊戲，與現代同類遊戲如此相像，只不過後者更驚險。圖中只見場內擠滿了中國人，還有長長的等候人群，場外不少男女、兒童正坐着東洋車和馬車陸續趕來，中國和印度錫克巡捕在維持秩序（酉五十六）。

至於租界當局組織的各種慶祝活動，如法國國慶、女皇生日等，街上總是人山人海，萬人空巷（丁八十；癸八十二—八十八）。最好的例子是，1893年11月租界舉行開埠五十周年紀念活動，中國各幫商人踴躍參加，紮燈結隊，敲鑼打鼓遊行（木五十九—六十三）。第二年為慈禧生日，商人及老百姓的熱情遠不及開埠紀念活動。可見，二十世紀前的上海人沒有強烈排外情緒，一般認為到二十世紀，上海的商人、工人、學生才具有非常強烈的政治意識及民族主義色彩⑪。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1876年英商建成第一條淞滬鐵路，1877年由清政府出資贖回，拆毀。當時報紙（包括《點石齋畫報》）提到此事時，都說「火車已肇行於滬，由上海達吳淞三十餘里，往返不踰二刻。惜為當道所格議，僨造作之費，遽毀成功」（甲九十六），「但在上者有意見不同之處」，對守舊政府的不滿，溢於言表。據當時《申報》報道，在火車通車之前，去觀看運材料的機車行駛的老百姓，每天已有幾千人。

英國倫敦《時報》駐滬記者寄回的報告比《申報》更詳細。這位記者還說，此地老百姓從來沒有對外國人及外國東西的本能排斥，有的只是無知，而這可以被官方利用⑫。這些是當時人人皆知的事實，可二十世紀的人提到淞滬鐵路，便稱官民一致反對。這也並不見得是有意撒謊，可能是不自覺地以二十世紀的民族意識去解釋歷史。

由於當時上海整個市民階級的文化程度很低，那些與外國人接觸最多的，往往是缺乏中國教育背景的人。西人家中的廚子、女僕、車夫等自不必說，即便是買辦也常常目不識丁（亨八十七）。正如梁啟超所說，當時「讀書人都不會說外國話，說外國話的都不讀書」⑬。買辦們講的不倫不類的英語被稱作「洋涇浜」，外國人到上海後也要學一段時間才能明白。這樣的文化背景，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也常常在相當表面的層次上。如上海人對賽馬、西餐館或其他娛樂接受很快，並且形成追求時髦的風氣。那些富家子弟惟恐別人不知道他們時髦。如畫報中多次提到的，當時上海花花公子的典型裝束是戴墨鏡、吸香烟，出門拿雨傘，不論甚麼天氣和季節。這些舶來品的功能已成為某種身分的標誌（辰四十九；書四十八；寅十八）。

上海市民由開埠初期的單純、好奇演變成有意追求虛榮、排場，已形成日後產生所謂「海派文化」的心態環境，似乎原有文化背景決定了對外來文化感興趣的層面。十九世紀末在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

書館等處參與翻譯西方著作的少數中國士大夫，如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發展的則是上海近代精英文化的傳統。

令人目眩的洋場風氣

上海原為民風淳樸的地方，移民的遷入迅速改變了這種狀況。租界的發展刺激了人們對物質生活享受的慾望。所有這些享受又必須以金錢為條件，於是傳統道德對上海人的約束力逐步瓦解，他們形成自己的價值標準。如當時人批評的，上海人只耻衣服不華美，只耻逛二等妓院，耻外出坐小車，耻去戲園坐二等，惟獨「身家不清不為耻，品行不端不為耻，目不識丁不為耻，口不能文不為耻，而獨耻此數端，亦可謂是非顛倒、黑白之混淆甚矣」②。

上海的繁華生活不僅吸引了富裕的人，也吸引了並無經濟能力享受的人。如1884年畫報中一少年挾妓乘馬車遊逛，恰為母親撞見，其母號啕大哭，因為兒子偷了家中契券抵押掉，然後在外冶遊（乙九）。當時還有一類叫作「空心大老倌」的人。他們並無錢，但打扮成時髦的花花公子，出入妓院、戲園，任意揮霍，待到積欠了相當債務後，便逃之夭夭。畫報中有五個幾乎相同的例子，其中四例是逛妓院後不付賬，一例是在書場點唱後，被發現其實身無分文。畫報形容他們「平時排場闊綽，衣服麗都，大搖大擺，徜徉於秦樓楚館間，有時挾名妓坐馬車，過市招搖，罔知顧忌，有時眼戴墨晶鏡，口含雪茄烟，與惡少數輩，酒食遊戲相徵逐，顧影風流，自以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這種人一旦



上海風氣之巨變，妓女竟混迹於上流社會堂而皇之的聚會，在固守傳統觀念者眼中，真是驚世駭俗之舉。

暴露真相常要挨打（戎十一；革三十二；行六十四；癸四十一；行六十四）。

由於上海人重金錢，傳統的等級觀念讓位於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來自士大夫階層的人抱怨上海等級已亂。王韜曾說，上海人服飾日趨華麗，但上下無別，那些做生意的暴發戶一有錢便穿起狐貉炫耀過市。1890年畫報一圖提到過去只有官宦人家才可稱其住宅為公館，如今上海不論其出身背景，所事何業，只要蓋得起漂亮的房子，便掛上「公館」牌子。作者挖苦一個沒受過甚麼教育的木匠，積攢金錢為自己蓋起住宅，但因目不識丁，誤將「公館」寫成「工館」（戎三十）。1891年畫報提到，從來只稱官宦家子孫為少爺，但如今在上海不論對方出身如何，只要看起來體面，便一概稱「少爺」（金二十二）。由於等級已亂，妓女也敢於僭越。吳研人曾多次感慨，「上海地方，久已沒有了王法」，「上海是個無法無天的地方」，一些妓女，老鴇可借種種名目，在死後出殯時用誥封宜人的銜牌^②。1898年畫報以「裙釵大會」為題報道上海道台蔡鈞妻子出面邀請中外上流婦女在張園開會，討論設立上海女學堂的具體事務，出席者有各國領事、律師的夫人及教會中修女、中國官紳的妻子共一百二十二人，其中竟有某藥房主人之情婦——妓女彭某（利三十九）。妓女敢公然混迹於上流社會之聚會，也是上海才有的現象。

租界中的工廠吸引了不少來自鄉村的婦女，租界中的繁榮也吸引了富裕、有閒的婦女出入一些為傳統婦女不該出入的場所。在畫報中所有關於茶館、烟館、戲園、酒樓的畫面中，都是男女混雜（如乙二十二；亥三十七；巳三十二；酉八下；金三十等）。去那裏的人大多醉翁之意不在酒，男女調情才是真正的樂趣。婦女上烟館在那時是很平常的事，有時男女結伴而去，有時婦女單獨去。1889年畫報報道一中年婦女與一少婦帶孩子去烟館，當她們橫臥烟榻時，孩子突然發病。作者並不以為婦女入烟館有何特別，只是認為不該帶孩子去（巳三十二）。更有甚者，自十八世紀70年代起，上海烟館改男堂信為女堂信，以吸引顧客。數年間，所有烟館都換成女堂信。畫面上可見女堂信作烟客的伙伴、同臥烟榻，還為之按摩、甚至調笑（丁六十六—六十七）。1873年上海道台與知縣分別出告示禁婦女作女堂信和入戲園看戲；1890年英租界會審員禁女戲子登台；1891年5月工部局出示不准烟館留客，不准婦女入館吸烟等。在此期間，《申報》多次刊登有關社論，如《烟館茶樓宜禁婦女說》、《重禁女堂烟信說》等。但以上禁令和輿論都收效甚微。如1885年畫報中有二圖講的是法租界上四家烟館仍僱用女堂信，被巡捕發現後，送到公堂公審。這些烟館主人和女堂信都受到鞭打及遊街示眾（丁六十六—六十七）。這樣的懲罰也還不奏效，1888年又有巡捕在烟館抓「野鷄」的報道（卯三十）。上海風氣的鬆弛，已到無法挽回的地步，戲園裏上演的多是淫戲。1874年上海道台沈秉成在《申報》登出禁淫戲告示，其中列有十八齣淫戲劇目。1885年英租界會審員出示禁淫戲。上海某個紳士對此憂心忡忡，到處奔走籌辦善戲，然而沒有觀眾，《申報》有社論評論道：「上海淫戲遍地，人心敗壞，豈是區區戲班可以挽回」，形容這種努力如「杯水車薪」^③。

在上海，男女交往的自由程度也非其他地區可比。畫報作者對鄉下

寡婦逃來上海與情人同居的新聞評論道，守寡本不易，「何況在上海，何況在今日上海」（辛十五）。畫報中還有「上海淫風之盛，甲於天下」之論（午八）。在此種風氣中，春藥的買賣也很興盛。1897年畫報提到：「售賣春藥向干例禁，恐其害人性命也，故有家藏此藥者必非常隱密，惟恐人知。上海則不然，說真方賣假藥一流人專以此等藥物助人淫興，曰壯陽，曰種子，巧立名目，層出不窮，大書特書，明目張膽。近年來此風更熾，受其害者不知凡幾，而後來者漫不加察，竟願以性命為兒戲。」（元十六）

來滬的投機者中不乏僧尼，他們在租界上租一二間民房，放上幾尊塑像，號稱「佛店」。這些和尚中很多是借開佛店名義行騙或是引誘婦女，中國官方禁止私自開設佛店，1876年8月17日《申報》有《查禁佛店》之社論。然而僧尼行騙的事常發生。在1890年的畫報中常有這類消息，如某五台山來的和尚，開佛店專引誘前來燒香的婦女（文四十）；某行騙僧人被抓並驅逐出租界，第二年又來上海行騙，再次被抓（未六十二）等等。時人常感慨「世運日非，人心日惡，誑騙之案層見迭出不窮」（戊二十八）。「邇來人心不古，曰盜曰賊曰流氓，紛紛擾擾，人皆視為難防」（亥九十五）。稱這類事還有專門用語，如流氓敲詐，勒索財物叫「拆梢」（己十七）；利用婦女與人假結婚，一二日後掠走財物逃跑叫「放白鴿」（午三，三十五）。

當時的人們還抱怨小流氓橫行。稱他們「小流氓」還並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年齡，而是因為他們還不像二十世紀高度組織化了的流氓。小流氓的形象是「三五成群，身穿密門鈕扣小衣，盤踞巷口，膽大妄為，無所不至。客有衣服麗都闊步經過，或搜其表，或取其洋，恣情搜括，與盜賊行劫無異，而調戲妓院之女傭，擲掄轎中之妓女，辱罵抬轎之夫役，任意叫囂，旁若無人，尤不足怪」（戊八十四）。

上海一方面成了中國當時物質進步程度最高的地方，同時也成為風氣最敗壞的地方。便是居住在上海的人也感慨「洋場為藏垢納污之地」（午七十），「將欲滅禮法廉耻，極人世間之不潔之行，而見所未見，則必到租界四馬路」（癸二十九）等等。蘇州離上海才一百多公里，但「那個時候，蘇州人家，不讓青年子弟到上海去，他們說，上海不是一個好地方，好似一隻黑色大染缸，墜落進去便洗不清了」^⑤。儘管上海的壞名聲使得守舊或自認有道德者不願涉足，但卻不能阻止各地人口繼續湧入。

結束語

按照文化霸權理論，上層文化總是控制、影響着下層文化。然而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上海租界的城市化過程中，這種上層文化在中國人口中並不存在。從前面租界人口分析，也從租界的性質可知，中國紳士作為一個階層在租界並不存在。他們一旦脫離原有社會結構，傳統功能也不再存在。在當時上海，已有一些白手起家的商人，由於經濟上的實力及與中外官方不同程度的聯繫而被稱為「紳商」，他們多少扮演了傳統紳士角色，但只限於實業或慈善事業方面，還未深入到控制意識形態的層

次；同時他們自己也還有不為傳統所接受的問題（典型例子是鄭觀應）。至於租界上少數維新士大夫，則一改傳統道路，致力於翻譯西方著作，主要是科學的工作，這是近代中國新文化的開端。但當時還只在初級階段，比起紳商，他們對社會的直接影響更小，所追求的西方知識，完全與普通市民無關。當時在上海形成的上下層文化，不存在溝通，文化間的鴻溝遠遠超過了明清時代。必須一提的是中國城內的紳士，他們仍發揮傳統功能，禁止婦女入烟館、茶館的建議，包括前面提到的某紳士籌辦善戲的例子，都表明他們的存在意識。然而他們不再能行使自己的權力，只能通過中國官方請求各國領事下禁令。然而由於脫離傳統結構，其實已失去功能。因此，匡救傳統的努力成爲徒勞。當時的租界出現了上層文化真空，換言之，上海平民文化是在不受上層文化控制的情況下形成的。上海平民無傳統道德負擔，十分樂於接受新鮮事物、西方物質文明。媚外的價值觀首先在平民中產生，早於中國知識分子。但這並不是由於下層文化對上層文化的影響，只是由於西方在經濟、政治上的壓倒優勢所造成。上海平民文化後來的確影響了上海文人，產生了學界認爲的所謂「海派心態」、「上海氣」。人們以「俗」、「淺」形容這種文化，無非是指市民趣味。到二十世紀發生的文學界的海派京派之爭，其實不過是上海平民文化的格調不爲京派傳統學者（傳統是指就趣味的高低而言，京派學者繼承的是傳統上層文化）所接受。

上述結論自可引出一系列問題，如上海下層文化在上層文化真空下形成的具體過程，新一代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成熟並重新企圖影響、塑造下層文化等等，都是極有價值的論題，然而不是本文所能解決的。

註釋

① 《點石齋畫報》，1884年為英人美查(Ernest Major)所辦，停辦於1898年。旬刊，每期八圖，前後共出圖四千多幅，用天干、地支、八音、六藝為編目。主筆者有吳友如等。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曾提到畫報影響之大，為當時要知道新學的人們的耳目。香港中文大學的《譯叢》1985年25期有Don J. Cohn的文章介紹畫報的背景並選譯若干幅畫報的文字介紹，1987年Don J. Cohn出版了選自《點石齋畫報》的譯文：*Vingnettes from the Chinese—Lithographs from Shangha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其他類似性質的兩本專著分別是中野美代子與武田雅哉的《世紀末中國のから版》（東京福武書店，1989）和Fritz Van Brissen的*Shanghai—BILDZEITUNG*（Atlantis Verlag AG Zürich, 1977）。

②⑩ 王韜：《瀛壖雜誌》卷一頁7、13，1875。

③ 蒯世勳：《上海公共租界史稿》，頁3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④ 羅志如：《統計表中之上海》，頁25、27、22，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1932。

⑤ 上海文獻委員會編：《上海人口誌略》，頁23-24，上海，1948。

⑥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頁1181，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 ⑦⑪⑭ 姚公鶴：《上海閒話》頁143-144、143、22，商務印書館1933。
- ⑧ 葛元煦：《上海繁昌記》卷二頁33。
- ⑨⑰ 滬上遊戲主人：《海上遊戲圖說》卷四頁8、卷二頁24。
- ⑫ G. Lanning & 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p. 295-296, Shanghai, 1921。
- ⑬ Kerrie L. Macpherson,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p. 1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⑮ 陳伯熙：《老上海》上冊頁183，上海泰東書局1919。
- ⑯ Fernand Braudel, *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p. 104, French version published by Librairie Armand Colin, Paris, 1979; English translation Collins, London, 1981; reprinted 1985。
- ⑰ Mary Ninde Gamewell, *The Gateway to China—Pictures of Shanghai*, p. 91,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6。
- ⑱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p. 13,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 ⑳ 詳見1876年3月23日、5月22日倫敦 *The Times*。
- ㉑ 梁啟超：《五十年來中國進化概論》頁3，見《最近之五十年》一書，申報館編印·1923。
- ㉒ 梅花庵主：《申江時下勝景圖說》卷上頁4-5。
- ㉓ 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79回。
- ㉔ 見1873年3月12日《申報》。
- ㉕ 包天笑：《鉏影樓回憶錄》第一冊頁180，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

葉曉青 現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歷史系博士研究生，1982-1985年間曾陸續發表《近代西方科技的引進及其影響》、《西學輸入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在近代》等論文，曾獲《歷史研究》創刊三十周年優秀論文獎。目前致力於近代上海平民文化的研究。